

“线上语言生活”多人谈

李 玮，王本华，陈卓铭，祝有肉、
杨 雪、张羽思，王 辉，宋 伟

将网络语言的发展推向艺术阶段

李 玮（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当语言遇到互联网，两者相互作用，出现语言网络化，产生了大量与网络空间相适配的新的语言现象，并催生出网络语言这一新概念。

从语言学角度看，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从文化与传播视角看，网络语言是一种新媒介，传递出网络社会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媒介环境学派的保罗·莱文森曾提出“玩具—镜子—艺术”的媒介技术演进论。从媒介进化的角度看，网络语言的发展变迁也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网络语言产生初期，网络技术尚不发达，网民数量有限，网民首次体会到网上背对背聊天的乐趣——匿名下的隐身，信口开言的自由，键盘上的狂欢。为适应这种崭新的表达场景，网民在键盘上玩起语言游戏，用语音变异、字母谐音、自创符号、将错就错等方式，任意创新语言形式。这个阶段，网络语言的确只是一种“小玩意儿”。

2000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开始腾飞，网民进入千万级、亿级，网络语言也进入井喷阶段，开始成为传递社会文化的媒介。许多热词由热点事件而生，因切合社会众生的心理，迅速破圈走红，“感染”整个互联网，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广为流传的“凡尔赛”“后浪”“躺平”“打工人”“干饭人”等等。网络空间的语言不再是领域语言，网络语言问题也不再单单是语言问题。网络语言成为一面镜子，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与折射。同时，网络语言作为媒介和载体，本身也滋生出大量社会问题，如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

从语言学角度看，网络语言的产生有利有弊。海量的网络词语及其形象生动的表现力，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却也带来破坏规范、冲击标准、引发代际鸿沟等问题。但从发展历程来审视，绝大多数网络语言都只停留在玩具阶段，大浪淘沙，很快被淘汰出局。从媒介角度看，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逐渐成为全民性词语，网络语言进化到镜子阶段，作为现实生活的折射、民意的表达、情绪的“减压阀”，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

根据保罗·莱文森的阐释，当新媒介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而且能够超越现实的时候，它就到了第三个阶段——艺术阶段。但是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网络语言还未能超越第二阶段，所承载的也只是暂时的社会文化现象；部分生命力强盛的网络词语，流行的时间长一些；只有极少数词语，进入词典成为一般词汇。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网络赋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网络语言本质上是网络技术的产物，随着技术的推进，更多的适配于未来的叙事方式会出现，语言所承载的社会内容也更加纷繁多样。因此，顺应网络时代潮流，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网络语言，使更多的优质网络语言进入艺术阶段，以丰富汉语词汇，提升汉语的时代感和表现力，为未来世界的叙事做好语言上的准备。

积极探索真正意义的线上语文教学新模式

王本华（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网上教学铺天盖地而来；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线上学习再次成为热点。当其他学科已广泛运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助力教学时，语文教育者却还在迟疑这样是否会影响学生涵泳文章、提高品位和审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以及国家层面的法令，让语文不可避免地面对线上教学这一新常态。如何适应，是今天的语文教育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传统语文教育向线上转变的过程。

首先是课程层面。相对来讲，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当我们意识到语文学习和生活关联密切，目的是在生活中运用时，“阅读报纸获取信息的能力”首先进入了课程专家的视野。之后渐次是广播、电影、电视等多媒体技术和网络的运用，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积极构建网络环境下的学习平台，拓展学生学习和创造的空间”，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都显示出课程要求在线上语文教育方面的发展。

其次是教材层面。随着课程层面的推进，编者也在努力将相应的内容融入语文教材，但整体看来效果还不够理想，更多停留在介绍如何借助互联网搜集信息和对网络的认识上。即便是新的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虽然按照“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专门设计了“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单元，但相对于日益活跃的互联网生活和丰富的课堂教学实践，仍显得简单而稚嫩。

最后是网络教学实践层面。21世纪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当课程设计者和教材编写者还在观望时，已经有一些先行者在课堂教学中探索如何利用互联网来提高语文学习效率。例如，北京特级教师顾德希早在2001年就撰写了《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一文，2004年申报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的实验研究”课题。相当一部分老师或学校也陆续开展了微课、慕课、混合式教学等新模式，以及对各类“互联网+教育”课程实践的探索。

当下，面对线上语文教学新常态，语文教育者应该适时从课程、教材及教学3个层面加强统筹研究。对中小学生这些网络“原住民”来说，线上的各种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各层面设计都不容忽视的因素。相对来说，课程设计者、教材编写者基本上多是网络“移民”，有些还尚未充分意识到网络的无限可能性，有些虽然能够意识到，但尚缺乏较好的可利用方案，所以这两个层面需要着力研究、解决：课程设计者应该提出方向性引导，教材编写者则必须给出实施的有效方案和解决策略，如在资源储备、资源共享、时空延展、自主研修、互助学习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资源和适切的建议。教学层面虽然不乏前文提到的那些有益探索，但眼下还有相当一部分线上学习无非是将现实课堂的内容原样搬到网上，未能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因此这一层面的研究、宣传、推广仍然是严峻的课题。

让课程、教材、教学形成合力,积极探索真正意义上的线上语文学习新模式,共同促进线上语文学习和线下课堂教学的融通整合,打造更加有效的语文教学新常态实施路径,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线上语言康复为康复者带来福音

陈卓铭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语言障碍中心) 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沟通交流障碍,其中发育、精神、心理、病理导致的语言障碍都迫切需要康复治疗。传统的人工语言康复主要是“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由治疗师个体与患者进行交流,据此判断病情,决定康复训练内容。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患者的需求,但存在对康复治疗师要求高、康复效率低、治疗强度不够等问题。因此,让现有的语言康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与患者语言需求相符,实现计算机模拟语言康复形式的拟人化,相当重要。计算机辅助语言康复,就是在治疗师或经过培训的家人的辅助下,应用程序化的计算机康复系统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模式。开发之初,因其丰富的视、听觉呈现,多种感官输入,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特别是听障者等残疾人的康复中。它可以通过运用多样化的语言素材、个体化的自适应训练环境,以及即时生动的反馈,克服语言训练的枯燥感,弥补传统治疗师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证语言康复的强度和效果。

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许多语言障碍者无法得到面对面的康复训练,这就对计算机辅助康复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因此,线上语言康复系统得以飞速发展,并成为大势所趋。线上康复真正实现了康复的连续性、可移动性、客观性、可重复性和智能推荐等,成为目前研究与应用的热点。

2021年至今,澳门政府通过卫生局下的仁伯爵医院与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语言障碍中心合作,构建了覆盖全澳门的特殊儿童早期筛查及早疗体系,这是一个将医院、学校、社区、家庭联结为一体的线上语言康复网络平台,它结合了澳门的语言使用特点、澳门文化特色,是专门针对澳门0~6岁儿童而设计的人工智能语言评估与康复治疗系统。该平台针对儿童语言及认知发育不同能力点分别构建了评估及训练模块,题库十分丰富,并且应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自动化的语言康复训练;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螺旋式的语言大小感知觉发育模型,进行各个维度的补缺及分层推送,极大地提高了儿童康复训练的趣味性及精准度。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语言康复模式从一对一的人工模式,到计算机对患者的辅助形式,再到一对多的智能推送线上模式,表1比较了3种康复方式的优缺点,未来将有可能实现智能机器人的康复模式。

表1 3种康复方式的优缺点比较

	传统语言康复	计算机辅助语言康复	线上语言康复
形式	面对面、人与人	治疗师或家属辅助下计算机康复	远程康复、家庭计算机康复
奖赏	物质奖赏,击掌认可	虚拟奖赏,击掌认可	虚拟奖赏
心理	更真实、更有参与感	更有吸引力、更高效	省时、方便、接受度高
话语发起	治疗师即时发起	事先存入素材,计算机给予指示	事先存入素材,计算机给予指示
优点	即时反馈	既能及时反馈,又能降低成本	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
不足	仅能一对一训练	同时需要旁人及计算机	缺乏面对面交流

影视创作应分情境合理使用网络语言

祝有肉、杨 雪、张羽思（自由编剧） 网络语言对影视创作的影响是伴随着网络视频门户网站的发展壮大而产生的，并强势地体现在影视作品中，因为制作方更倾向于使用“低龄化”的表达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选取年轻人最熟悉的语言。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生代表达方式，富含某种当下性和特定的情境（也就是“梗”），因而能更快、更明确地在某一圈层中获得共鸣。

从形式上看，相对于制作周期更长的电影、剧集，网络语言对制作周期短、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短视频创作影响更为明显，并通过短视频的转发、复制，形成更大规模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又催生出新的网络流行语。《脱口秀大会》《奇葩说》等网络综艺节目也充满了网络语言，因为相对于官媒，网络平台的语言使用更加活泼，且网综本身就有大量的个人参与，个人的语言必定具备时代特色，身处网络时代的个体是无法回避网络语言的。

从内容上说，与日常生活越相关、娱乐性越强的萌宠类、家庭伦理类、都市情感类等网络剧、网络电影，因其内容生活化、受众低龄化，往往会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语言，如《爱情公寓》《爱很美味》等。在流量为王的当下，网络语言可为作品的迅速传播带来较大优势，而且一些网络语言又会在新作品中催生出新的“梗”，形成新的网络流行语，更利于传播和复制，二者互相助推。而受众的年龄和文化圈层更高、内容更为严肃、更能体现“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则较少使用网络语言，如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等。

就影响而言，使用网络语言可以改变影视作品的基调，使其更加迎合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审美趣味，同时改变传统影视剧中影视人物规范的口语表达方式，比如“臣妾做不到啊、我emo了、skr”等。此外，网络语言的应用对影视创作的逻辑也会产生影响，比如我们在写影视人物小传的时候，可能会用“普信男”“绿茶婊”“白莲花”等来概括角色的性格标签，以便迅速把握人物性格。当然，有时这样反而不利于塑造人物，例如，虽然“渣男”能够让双方可以更高效地领会其中的含义，但这种“粗暴”的概括也会让原本复杂的人物变得扁平。

目前，网络语言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情境下逐渐取代或代表某种固定的表达，在人物的刻画上适当运用网络用语能使人物更鲜活、更具时代气息，但要杜绝大量使用网络语言所造成的“语言空转”现象。网络语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殊性，容易走红，但也容易过时，影视作品的制作周期会导致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在播出期时过境迁。影视创作中，要根据创作题材来考虑是否使用网络语言，同时在网络用语的选择上也须慎重，一些不尊重本地文化或者本身就有不良含义的网络用语，应杜绝使用到影视作品中，做到分情、境、地合理使用。

网络语言暴力需要综合治理

王 辉（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 随着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们身处众声喧哗之中，真相有时变得扑朔迷离。新媒体由于在交互性、即时性、自主性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已然成为人们诉诸情感、宣示观点的主阵地，在信息传播中，“事实”往往

被“情感”解构,已不再是媒体传播的核心要义,情感宣泄和舆论操控反而成为传播的主要目的。因此,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时有发生,粗鄙低俗之词在网上大行其道。粗言秽语不仅是某些网民发泄不良情绪的方式,还是他们侵犯他人名誉、隐私,造成他人心理创伤的“锐器”,并且进一步成为他们进行网上身份建构和社会联结的工具。

网络语言暴力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也让公众对新媒体的语言环境忧心忡忡。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将严重的网络暴力纳入公诉案件”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当前,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亟需加强治理。

网络语言暴力从表面看是语言使用问题,实质上却是社会问题的真实映射。网络语言暴力的治理非常复杂,不仅涉及法治环境、媒体监管政策、语言监测手段等,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问题。因此,有效治理网络语言暴力必须采取一种综合疗法。

第一,法治手段是解决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的根本路径。可通过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预防和制止网络语言暴力,“以法制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切中语言治理的痛点、难点,一方面要提高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降低网络语言暴力案件的诉讼成本。第二,加大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新媒体平台应对网络博主、短视频发布者等新媒体人所传播的内容承担起严格审查的责任。如出现网络语言暴力监管不到位、甚至放任网络语言暴力发生等行为,要对平台运营方依法依规追究处理。第三,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科学有效治理。可建立网络语言暴力动态监测平台,对语言暴力进行事前研判、实时监测和趋势分析,对语言暴力事件出现的热点领域、关键节点和相关因素等进行精确判断,从而实现精准治理和智慧治理。第四,大力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树立语言文明风尚。网络语言暴力的治理最终依赖于网民的媒介素养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媒体可通过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倡导语言和谐,规范网上言语行为,提高大众对网络信息的理性认知,让语言文明在网上蔚然成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研究”(20BYY058)

在线上,我们是否还会有一种“语言生活”?

宋伟(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语言生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概念,它让我们想到了胡塞尔“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主张。从“生活世界”的理论视域看,应该将“语言生活”置于“生存论语言观”或“生活论语言观”的视域中来加以理解。这有别于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在胡塞尔看来,“世界”早已迷失在工具性语言设置的迷途之中,抽象语言概念所构筑起来的“科学世界”越来越远离了“经验世界”或“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即“语言生活”的世界,才是活生生的、感性的、真实的“经验世界”。

按照生活论语言观的思路来理解“语言生活”,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概念的“符号”,而是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这意味着,语言必须存活在活生生的生活“语境”之中。简言之,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可以脱离“生活语境”的,一旦脱离,也就意味着脱离了生活,所谓的“语言生活”也就会随之瓦解消散。

到此,我们可以讨论“在线上,我们是否还会有一种语言生活”这个问题了。按照上述思考路

径，答案是否定的。现如今，伴随传媒技术的发展，再加之“疫情时代”或“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网上、云端等各种各样的线上交流方式层出不穷，从最高级别的国家元首会议，到“二人世界”的日常“私聊”，一切交往都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在“时空分延”中播撒弥漫，以至于人们已经将其称之为“线上生活方式”，或许也可称之为“线上语言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的是，线上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仿真的世界，虽然它甚至可以达到“超真实”的境地，但毕竟还是一个“脱域于生活世界”的“拟像仿真的世界”。在鲍德里亚看来，拟像仿真有别于虚构或谎言，因为虚构或谎言不过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真实的东西，而拟像仿真却彻底地瓦解了虚拟与真实的关系，将真实世界吞噬进拟像仿真的“超真实”世界。对此，鲍德里亚甚至断言，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真实早已被拟像仿真所“完美地谋杀”了，而且这场谋杀悄无声息，因此成为一种完美的罪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们也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按照鲍德里亚的思路，与其说互联网时代的线上语言方式改变了人类语言生活方式，不如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真实经验的语言生活世界本身。因而，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线上语言方式同样难以逃脱寄生于“虚拟仿真世界”的命运，甚至于也同样参与了真实语言生活世界的“完美谋杀”，它是否还可以被称为一种“语言生活方式”？或者，它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生活”？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责任编辑：逯琳琳

本期“线上语言生活”专题由汪磊组稿；“语言跨界谈”由李旭练组稿；中文摘要由朱剑审稿，英文摘要由李崑、周明朗、赵守辉、阎喜、尚国文译审，方小兵终校英文内容。特此感谢。